

◎盛世华光

阜平的新生

蒋 巍

战火中的“树叶训令”

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,过去,这里石连石、山连山,种地就是搬石头、刨大山,农家的住房是石头加草顶,吃食是玉米、土豆加野菜。抗战时期,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游击队建立起来后,生活极度困难。有一年闹春旱,部队和百姓的存粮都已吃光,只好到处挖野菜、摘树叶。为此,边区政府特别下令:凡距村庄5里之内,所有政府人员和部队不得摘取树叶,都要留给乡亲们当吃食。这一纸训令一直流传到今天,也感动着今天的人们。抗战兴起后,阜平成为晋察冀边区首府,两万多阜平子弟参军参战,5000余人壮烈牺牲。当年在阜平战斗和生活在阜平的人们,一直牢记着这一切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电影演员田华到这里体验生活,回到北京,拿出两个黑乎乎的野菜饼子给聂帅看,说现在阜平人吃的是这东西。聂帅不禁掉了泪,说:“当年,9万阜平百姓养活了我们的9万军队,他们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……阜平不富,死不瞑目!”

阜平,就这样成为党和政府始终不忘的牵挂和关怀。

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,2012年12月30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考察,也正是在这里,总书记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动员令。

彻底改变太行山区的穷困面貌,谈何容易?阜平山高坡陡,土地贫瘠;阜平的日子和山路都蜿蜒在悬崖峭壁和石头缝里。这些年政府搞招商引资,外地老板来考察,有的小车在山道上走了不到一半路,连吃饭的小店都找不到,就掉头回去了。重重大山封闭了道路,也封闭了阜平人的梦想。大部分年轻人跑到外地打工,村里只剩下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连耕地都撂荒了。

总书记的到来,极大激励了21万阜平干部群众的斗志。

千年穷困史,到底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彻底结束?这是历史的沉重追问,更是新时代的严峻考验。

行动开始了。成千上万的阜平干部带上行李卷,住进每个村,一户户走访调研,登记造册,问计问策;来自党和政府的暖流,一股股流向乡僻野,包括只有三五户的小山村。这是共和国历史上、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开发“国家行动”,而且,干部住农家吃的每顿饭、每一宿都要交钱。3年过去了,干部要轮换,很多“结对子”的干部和农户成了经常走动的“亲戚”。一位干部带着他上中学的女儿来看望农户,出了门,父亲给她讲了战争年代“树叶训令”的故事。女儿说:“以后我要好好学习。”父亲问为什么?女儿说:“长大后,我要来帮助他们。”

“只要有信心,黄土变成金”

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,阜平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干部深入基层,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,过后,一个历史性的讨论摆到每个干部面前:阜平已经穷了上千年,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把阜平推上致富之路?老同志摇头者多:“我们以前试过很多办法,比如县里曾大力推广过“两种两养”,就是种核桃、大枣,号召养牛和养羊。可力气没省下,效果很一般。这些年产业没少搞,赚钱却很难。”

调研越深入,县委书记越痛切地感到:一是地处山区、普遍贫困的阜平困难确实不少;二是很多发展项目推广下去,依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,抗灾能力差,打进市场难。结果上上下下对拔掉阜平穷根越来越缺乏信心,一个个脱贫项目还没见成果就半途而废了。县领导班子意识到,阜平要脱贫,最重要的是树立信心,改变观念。如今,科技化、产业化已成为国家发展大计,我们不能再唱千年不变的老旧本,致富一定要找新路子。

于是,县里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农林牧业各方面的专家,把阜平走了个遍,果然有

了新主意:专家们说,阜平山多坡多石头多,耕地零零碎碎,这样的地域条件,种玉米土豆只能糊口,如果大规模改种食用菌,就可以扬长避短了。

一个建议,惊醒了全县!经过市场调查,县领导们大喜过望: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,14亿多国人都在吃蘑菇,正是很热门的一项好产业啊!

不过还是有人担心,广泛推广种蘑菇在阜平是个新鲜事,作为一个新产业,把大量土地和人力物力投进去,风险太大,一直穷得叮当响的阜平可经不起折腾啊!

县委书记铁了心,立下“军令状”。

但是,因为以前吃过“两种两养”的亏,阜平老百姓普遍有顾虑,干部下乡搞动员,好话讲了万万千,村民们兴趣不大。

很快,县里专门成立了食用菌领导小组,时任县长刘靖亲自出任组长。领导小组提出一个新思路:“企业干两头,群众干中间,科技打头阵,保险担风险,金融做支撑,政府当靠山。”简单地说,就是乡亲们只管种菇,管理、收购、科研、技术推广等都交给企业来办,实行一条龙管到底。

大规模种植食用菌,需要大面积建菇棚,建菇棚就得通过流转把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。县里很快出台了新政策:流转一亩地,每年补助1000元。乡亲们掐指一算,有了流转金,就等于这一年早涝保收,再去食用菌企业做工,干一天就能拿一天的工资,何乐而不为呢!

种好食用菌,必须靠技术。于是县里请来许多专家,分村分组,进村入户,手把手帮助指导菇农解决遇到的难题。有一次,史家寨乡农民李向文的几根菌棒变红了,明白人一看,那是患了“红粉菌”病,传播很快,搞不好就要绝收。消息迅速报告到县里,县长刘靖立即拉上专家侯桂森往史家寨赶,侯桂森把治病方法详细讲授给李向文。交代清楚后,几个人正要上车,李向文拦住他们道:“得了红粉菌,已经亏了,要是施了药还治不好,亏上加亏,算谁的?”侯桂森一愣,刘靖拍了拍李向文的肩膀说:“你就听侯教授的吧,放手去治,真出了问题,我担着!”

这时,一位前来看热闹的菇农突然问:“种香菇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,为啥不见村干部来种?”

这句话把刘靖问得心里一震。是啊,看来好事要办好,也需要干部带头,乡亲们心里没底,更需要干部带头。这以后,每周二、周五晚上,食用菌领导小组都要开会,并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和家人要带头种、做表率,给乡亲们当好开路先锋。两年后,菇棚普遍挣钱了,想承包的村民越来越多,村里的菇棚不够分了,县里又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村干部,把自己包的菇棚让出来。

不少村干部想不通,刘靖在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:“大家还记得抗战时期的‘树叶训令’吗?当年晋察冀边区闹灾荒,聂荣臻司令员命令部队,村庄附近5里地的树叶,碰都不能碰。为啥?不与民争食!战士们宁肯饿着肚子打仗杀敌,也要给乡亲们留口饭吃。现在我们号召干部让群众让出菇棚,跟革命先辈比起来,这算事儿吗?”

种菇产业发展得越来越红火,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,但管理技术也需要更快提高。食用菌领导小组很快制定出一整套菇棚工作流程。从菌棒入棚、出菇管理,到每个菇

棚放多少菌棒等技术指标,都做出明确规定。农民李向文按照专家侯桂森传授的管理方法,那一年不仅没亏损,还赚了上万块钱。尝到甜头的他,对县里的产业思路更有信心了。他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合作社,实现了种、管、收、卖一条龙,眼光和市场大大地开阔了。当时,外地很多地方种的是传统口蘑,两年才出一季菇。在阜平,专家们研发出系统化的食用菌高效生长技术,一年可出一季菇,村民的收入大为增长。

科技一向是事业发展的先导。专家侯桂森又提出新主意:“现在阜平一年出一季菇,要8个月时间。还有4个月菇棚是闲置的。如果建成温室型出菇棚,可以两年出三季菇,这样大棚就不会有闲置期了。”

全县农民手里都有了“闲钱”,温室型菇棚很快推广开来,棚内还普遍配备了立体床架、微喷、风机、水帘等设施。此后阜平很多农村合作社升级为食用菌生产企业,采用了全自动灌装制棒、净化制冷等先进技术,建成了智能化养菌车间,跨进了工业化管理和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。一朵朵美丽香菇,就这样富了大山里的阜平!

时至今日,阜平县的食用菌产业覆盖了140多个行政村,受惠群众5万多人,超过全县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。阜平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从2012年的3262元增加到2021年的12342元,整整翻了两番。

初心——永远的牵挂

治穷先治愚,扶贫须扶智。一位老党员义务支教18年,用音乐改变乡村的感人故事,就发生在阜平大山深处。

这位老党员叫邓小岚,是老区时代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长女。小岚生于1943年,因父母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,不得不把她委托给阜平的一户农家抚养,直到北京和平解放才进了城。也因此,小岚一直把阜平当作自己的“第一故乡”。有一年,她回到马兰村,给太行山上的革命烈士扫墓,马兰小学的孩子也参加了。邓小岚倡议:“孩子们,我们一起来唱国歌吧。”没人吱声。邓小岚问:“没有老师教你们唱歌吗?”孩子们摇了摇头。邓小岚深感痛心。她知道,马兰村曾是晋察冀日报社驻地,抗战时,乡亲们白天在地里干活,晚上跟着报社同志学识字、学唱歌。那时的太行山天天歌声飞扬,唱出了老区军民同仇敌忾的气势,更唱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山里娃反而不会唱歌,这哪行呢?

回到北京后,邓小岚久久凝视着父母留给她的一枚印章——“马兰后人”,这枚印章,镌刻着父母对她的最大期望啊!那一刻,她毅然决定:退休后回马兰,用自己的专长,为老区乡亲们做点实事好事!

从那年起,邓小岚每年就像请探亲假一样,总要回马兰,到当地小学开展义务支教。那时马兰村的教室很破旧,邓小岚自己掏钱,把教室翻修一新。她又从同事、好友那里募集到各种乐器,运到马兰,成立了一个马兰小乐队,教孩子们唱歌和演奏乐器,并发起建立了“马兰儿童音乐节”,带孩子们到各地演出。

随着时间推移,“马兰儿童音乐节”影响越来越大,竟引起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导演组的注意。2022年2月,在邓小岚的带领下,44名阜平娃登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大舞

台。孩子们头戴小红帽,脚踏虎头靴,一曲希腊语的《奥林匹克颂》,唱得声情并茂,令全场观众为之动容,也赢得全世界观众的喝彩。

不久,马兰村里建起了月亮舞台,修建了音乐广场,不仅有名声在外的马兰小乐队,还成立了马兰艺术团和马兰秧歌队。逢年过节,来自全县各地的演出邀请一个接一个。乡亲们说,物质上富裕、精神上富有,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!

牛童,90后小伙子,北京人。3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,在阜平做工程的父亲带他到村里玩。村外山水风景如画,村里新楼栉比相连。村边有一大片空地,上面盖着新土。牛童问父亲:“这里是准备做什么的?”父亲说:“以前这里是座荒山,以后要搞成耕地了。”“山呢?”牛童惊讶地问。“被移走了。”父亲云淡风轻地说。

见儿子不解,父亲接着解释说:“阜平县一向人称‘九山半水半分田’,人均耕地面积太少了。所以县里下决心把一些荒山削平,拉来泥土,再改造成耕地。”

牛童听得目瞪口呆。他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,想不到,古代传说中的故事就在眼前上演。太行山穷是穷,可这里的人有雄心有魄力,山都能移,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!

牛童激动地对父亲说:“我在外国见识了很多现代化技术成果,我想在这里租一块地,做生态农业,在阜平县带个头。”父亲很高兴:“你的想法很好,我支持。”

很快,牛童把几个好朋友动员过来,组成一个团队,把行李搬进阜平的大山。数年间,他们种了3000多亩黄桃、3000多亩苹果,在山里打造出一个电子化、数字化的“智慧果园”。

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县委书记刘靖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,他们一起来到智慧果园,把果园转了个遍,最后走进中心控制室。那里摆着一排排仪器,还有一个电子屏幕,屏幕上不断闪动着串串数字。“这些数字是啥意思?”刘靖指着屏幕问。“这是我们设计的智能系统,用来观测果园的温度与湿度。”牛童骄傲地介绍说,“比如这串绿色数字,就是土壤湿度。如果这个数据偏低,就意味着果园应该浇水了。”“听说你们坐在电脑前,就把地里的活干了,是真的吗?”刘靖又问。“有些工作,比如水肥浇灌、虫情防治,不光坐在电脑前,就是出差在外,点开手机里的APP,也能远程操作。”“你们的果子卖得咋样?”“阜平的土质因为靠山,矿物质特别丰富。今年黄桃大丰收,在北京的超市里,上架5个小时就卖光了!”“好!”刘靖举起大拇指高声点赞说,“你们这个果园,亮点就在‘智慧’两个字,证明科技兴农在阜平大有可为!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吸引鼓舞更多的年轻人,在阜平这片沃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!”

整整10年了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翻山越岭、进村入户时留下的殷切嘱托,仍然时时回响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。“只要有信心,黄土变成金”,正在太行山下变成壮丽的现实。过去没见过汽车、火车的山里娃,如今套上工作服,走向纺织、制衣、食品的流水生产线;过去一个个泥浆满地、杂草乱飞的老山村,搬进了高楼林立的新社区;过去那些老旧寂寞的小镇,如今出现了一个个欢声笑语的文化站、新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院……

只要说起这10年,这里的人们都笑容满面、激情四射:“过去,我们做梦都梦不到山外头,因为我们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啥样。如今,世界已经走进我们山里头,吸一口空气都比城里甜。”不少农家新房盖得像小别墅,院里还停着私家车。到一个农家做客,主人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:“放心,都是自家种的纯绿色,我们的炊烟也比别处香呢!”

是啊,此次太行山,走访阜平,好些人在说,十年巨变越千年,千年梦想在实现!10年来,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阳光已铺满阜平大地。党和政府的温暖正涌向一个个新村、一家农户,多少人的命运已经改变,多少人的梦想在此实现……

是啊,新时代的壮美生活正在我们身边徐徐展开,新的奋斗、新的幸福将接踵而来。

母亲在年轻时落下眼疾,看东西吃力,怎么认得我乱画的小人书?到晚年,母亲的眼疾严重了。父亲患有肺病,走路吃力,出门买菜全靠母亲。好在父母住的小区,出门有超市,拐过弯有餐厅,买菜吃饭倒不犯难。最后一段路,父亲是母亲的眼,母亲是父亲的腿。我在天涯。

透过街边的杨柳,我望着通往单元门口的一段路,大约有50米。之后的几天,我许多次凝望着它,仿佛母亲牵着父亲,还走在这条路上。

整理父母的遗物,我找到一个四方的小本,打开,才发现是一本父亲写的日记,我读到这样一个场景:吃过年夜饭,母亲推说眼睛疼,不看电视,进里屋睡了。父亲在沙发上坐着,想着。过一会儿,听母亲在里屋喊:“老昌啊,你在外面闹腾什么呢?吵得人睡不着。”父亲说:“找本书看。”母亲说:“找宏儿画的小人书吧?这两天我看着呢。”

站在高处俯瞰,是一片紫红色的海洋,站在地上望去,是看不见尽头的绿色屏障,这就是高粱地。在大片的高粱地里,不要说藏下一个人,就是藏下一个连、一个营,从外面也看不到任何异常。“南方的甘蔗林,北方的青纱帐”,如果把青纱帐比作房屋,高粱就是青纱帐的屋檐。谷子是青纱帐的组成部分,大豆也是青纱帐的延伸,而真正的青纱帐则是玉米和高粱,尤其是高粱。

高粱红了

郭 华

高粱栽培的历史非常悠久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“酿酒始祖”叫杜康,汉代的《说文解字》记载:“杜康始作秫酒。又名少康,夏朝国君。”这里的“秫”据说就是高粱。考古发现江苏新沂县三里墩西周遗址中有碳化的高粱秆和高粱叶,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时的赵国遗址中,发现了两堆碳化的高粱粒。这说明至少西周和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在种高粱。清朝前期高粱得到大面积推广,那原因真的想不到,是因为水灾。治水就需要筑堤,要想堤坝结实就要加筋,于是,就把高粱秸埋到土里面,发挥筋的作用。这样每年需要大量的高粱秸,高粱的种植面积随之扩大。但高粱作为粮食并不好吃,于是便尝试用来酿酒。用高粱酿的白酒还真的好喝。可是,历朝历代都不允许随意用粮食酿酒,清朝更是如此,因为“酒占人食”而施行严苛的禁酒令,高粱再难吃也是粮食。直隶总督李卫上奏乾隆皇帝:“宣化府地方所产高粱,有味苦者,惟凶年乃以充饥,丰年宜听其烧酒。”此例一开,高粱白酒大行其道。

其实高粱不只是酿酒。虽然明朝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·种植》、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谷部》中都记载高粱,但都不如元朝王桢在《王桢农书》中对高粱用途介绍得详细:“蒸高丈余,穗大如帚,其粒黑如漆,如哈眼。熟时收割成束,撻括而立之。其子作米可食,余及牛、马,又可济荒。其梢可作洗帚,秸秆可以织箔、夹篱……”高粱穗脱掉籽粒后,不仅可以做刷锅洗碗的炊帚,还可以做扫地的笤帚。我们小时候的笤帚都是高粱穗子做的,挺括好用。但多数高粱的穗头是抱紧的,做笤帚的是一种穗头散开的高粱,每年种高粱时,刻意种一部分这样的高粱,秋天后给大家做笤帚。高粱从穗头到第一个节点那一段叫“提杆”,最广泛的用途是缝制帘篷,可以做锅盖,也可以在包饺子时用来放饺子,现在还有人用。农村的人到城里串亲戚,有时还带上两个盖帘送人。提杆的另一个作用是用来做工艺品,我就见过用提杆插制的黄鹤楼,不仅逼真,而且高雅。当然,拥有这种手艺的人如凤毛麟角。

高粱秸秆我们叫林秸,林秸的皮可以剥下来织席,林秸还可以直接编箔,用来苫盖东西。再就是插篱笆,在院子里种上两畦菜,为了防止家禽破坏,就用林秸插上一圈篱笆。如果是爬蔓的蔬菜,比如丝瓜、扁豆,还可以爬到篱笆上开花结果。不论是春天篱笆上的黄花、紫蕊,还是夏秋季节吊挂在篱笆上的丝瓜、扁豆,都是农家院落的一道风景。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动手,用林秸做玩具。林秸皮按照自己的需求劈成一条条,插在林秸芯上,做成各种形状的玩具。

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,我们那个地区提倡种“两红”,即红薯和高粱。其实高粱不仅比玉米难吃,而且产量也并不比玉米高,但是,比玉米管理粗放,对水肥要求相对较低,最重要的是更适应盐碱地种植。农村“大包干”之后,农民有了自主权,第一个被淘汰的粮食品种就是高粱。后来我回老家想要看高粱,老家的妹妹哈哈大笑:连猪饲料都是玉米了,哪里还有高粱。

没有人种高粱,高粱稀缺了,可酿酒又离不开高粱,于是高粱反倒成了经济作物。随着收购价格的提高,有人又开始种高粱了,而且不是一般的种植,是“订单农业”,先和酒厂签了合同再种。面积也不是千八百亩,家乡有人流转了上万亩土地种高粱。在高粱红的季节我赶了过去,那真的是壮观,一直自嘲农民出身的我,却第一次看见那么大面积的高粱。品种有些像当年的多穗高粱,秆秆矮了些,穗头大了一些,红红的籽粒泛着淡淡的金黄色。秋风吹来,绿油油的叶子轻轻摆动,像是在亲切招手。

许多人在高粱地头拍照留念,高粱成了打卡地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三十年前没有人想到有一天高粱会成功逆袭。

回到家正巧收到一份家乡的报纸,头版头条即是《高粱产业“映红”乡村振兴路》,高粱又红了。



幼儿园大班那年,我得到人生第一本人小人书。阿姨给我们念小人书,却从不把书念完,中间穿插着意想不到的事情:吃饭擦桌睡午觉,叠纸唱歌做手工。都听话,她才继续。我记住了这个流程。多年以后,把它用在我自己身上。

我想要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,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。跟母亲磨过几回。有天傍晚,母亲弄熟一碗米饭,用筷子戳开一颗咸鸭蛋,小勺挖出蛋黄红油,拌着饭给我吃。我说:“妈妈也吃。”母亲拗不过,说:“你吃一口,妈吃一口。”母子俩围着一颗咸鸭蛋,

我与小人书

昌 宏(德国)

一小勺一小勺吃到掌灯,总也吃不完。后来我一个人漂泊海外,总想起那个吃咸鸭蛋的夜晚。要是再有一颗那样的咸鸭蛋就好了!吃完鸭蛋,母亲在手心一搓,蛋壳“变成”一本小人书,碗口般大小,带点鸭蛋黄的香。我央求前院的哥哥姐姐给我念小人书,逐渐明白了书中讲的是一个革命者发动群众打鬼子的故事。小人书在哥哥姐姐们中流传,再传我手里,书的前页卷得有点坏,后面少几页。那是母亲给我买的第一本人小人书!上学后识了字,总想将小人书的后几页补全,就裁了纸,在纸上作画,一页页往下

编。同桌的阿明看了,笑我故事编得太烂,抢过去他来。阿明敢这样,是因为他爷爷藏着一抽屉小人书。读过一抽屉小人书的阿明,故事肯定编得比我好。我开始自己画小人书。我画过7本小人书。我还买过小人书。有一套叫《敌后武工队》的小人书,我从第一本买到第五本。长大后,我到外地上学,后来出国。小人书早已不知去向。那年回国,母亲问我:“记得你当年画的小人书吗?都给你留着呢。”我难为情地说:“小时候乱画的东西,留它干嘛?”母亲说:“有时候想看,挺有意思的。”